

以人民文艺凝聚中国力量

韩毓海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创作的基础,是我们文艺创作的“初心”,这样的初心,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“人的本质力量”。当代中国优秀的文艺作品,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人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。可以说,只有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磅礴力量的艺术作品,才称得上真正的当代杰作

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?作家艺术家为什么要在与人民相结合上下功夫?我们为什么要把立场和情感转到人民那里去?我们为什么要唱响“美丽中国”?

也许有人将此看作“老生常谈”,但是,要真正回答好这样的问题,其实并不容易。因为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,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,“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、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,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。”

克服艺术家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

人民的文艺还是个人的文艺?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,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问题。

马克思在《论犹太人问题》等著作中指出:从“公民”向“市民”的转换,是西方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转变。黑格尔在《美学》中认为,希腊古典主义是西方艺术最高峰,这是因为在希腊城邦,每个人既是个人,也是城邦公民,在这里,个人与共同体是高度统一的。在此基础上,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也是高度统一的。在希腊艺术中,我们看到的既是个人的喜怒哀乐,也是城邦的喜怒哀乐。因此,希腊的艺术既是城邦的艺术,也是作为个人的“公民的艺术”。

但是,随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兴起,个人与共同体分离了,人变成孤独的个人,每个人追求的只是个人利益。这样,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处于全然的对立,艺术属于个人,与共同体没有关系。马克思深刻指出,这个时候,不是身为公民的人而是身为市民的人,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、真正的人。换句话说,资产阶级艺术所表现的,不是作为“公民”的人,而是作为“市民”的人。他们所谓的“文学是人学”,无非是说文学是市民社会的专利。

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,是一个在更高层次上重建人类共同体的辩证历史过程。《共产党宣言》说,“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,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,在那里,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”。也就是说,只有把个人自由与人类解放、与共同体的自由紧密结合起来,才能解决艺术上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和分裂这个根本问题。然而,正像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与对立,是一个必然的、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,解决这一问题,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。

在个人与共同体分离对立的漫长历史过程中,作家能否通过艰苦的努力去超越和克服这种历史限制呢?实际上,那些伟大的作家就是这样做的。在他们那里,艺术的原则战胜了他们的历史和阶级局限。曹雪芹如此,托尔斯泰也是如此,他们笔下的每个人物既是栩栩如生的“这一个”,同时也折射着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但是,也必须看到:有一部分艺术家、作家、导演,却很难做到这一点,在他们那里,每个人物、角色,都是他们个人制造的“角儿”。

要解决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分离的问题,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个人与共同体分离

与对立的问题。简单地说,就是解决好作家与人民关系的问题——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础。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高层建筑的认识、对人类解放事业的深刻理解之上的。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,解决这样的问题,有些伟大作家可能是不自觉的,即可以是像曹雪芹、托尔斯泰那样,通过对艺术原则的捍卫和追求,去超越历史和阶级的限制;也完全可以自觉的、主动的,即像写出《阿Q正传》的鲁迅、写出《子夜》的茅盾、写出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丁玲、写出《创业史》的柳青那样,从思想上解决自己与人民的关系问题,自觉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分子,自然解决诸如内容与形式关系这样的创作问题。

在感情上爱人民才会有真正的艺术

与人民相结合,关键是感情的转变。习近平同志指出:“有没有感情,对谁有感情,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。”因为在口头上,大家似乎都赞成文艺为人民服务,在感情深处却不尽心。如果在感情上不爱人民,大家写的东西就不生动,不会感动人。

什么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呢?我想起了这样的事: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宗立冬,现为宁夏某乡党委书记,宁夏春夏风沙很大,有一次,细沙吹进他的眼睛,无论怎么冲洗也出不来,当地一位老奶奶,把他眼里的沙子舔了出来。北大还有一位毕业生,在祖国西部的阿克苏地区担任某乡党委书记,他驻村联系了一位老奶奶,每天都会给老奶奶打一个电话,每次通话,奶奶总是说:孩子,你工作不能太累啊!而放下电话,奶奶都会偷偷地流泪。有了这样的感情,才会有真正的艺术。

这两位年轻人可以做到的事情,能够在实践中懂得的事情,象牙塔里的作家们,却不一定懂得。在革命战争年代,作家都知道,要与人民在一起,与普通战士在一起。进城了、胜利了,有了办公室,坐了机关,但是,如果以开会落实开会,以文件落实文件,如果闭门造车,关在象牙塔里,即使“把手指甲都咬出水来”,恐怕也写不出真正深入人民内心的作品,原因就是没有产生与人民生死与共的感情。

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,因此,就没有抽象的“爱的文学”。这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价值中立的学问,历史上那些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,都是对特定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的回答。

任何学术,都是与各民族所处时代的境遇相呼应的,渗透着特定时代、特定民族的价值追求。有些人研究经济问题,得出自私自利是亘古不变的人性的结论,马克思写作《资本论》,却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,指出了人类解放的道路和方案,这里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立场与初心。

文艺更是如此,我们的立场是为中国人民做学问、为中国人民创作,如果跟在人家后面爬行,亦步亦趋,如果爱着人家的爱,恨着人家的恨,西风吹得游人醉,却把他乡作故乡,丧失了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艺术独立,就谈不上真正的学问、真正的艺术,更谈不上学问和文艺的原创与发展。世界是多元的,文化是差异的,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,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立场、初心和出发点,这就是文化的自觉。

克服市场和资本对文艺创作活动的腐蚀

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指出,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。劳动,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。劳动不仅追求财富,也体现着劳动者的思想和自由意志,体现着“美的追求”这种人的本质力量。因此,他说:人也按照美的原则创造。但是,资本主义制度却造成了劳动的异化,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,马克思深刻指出:“劳动创造了宫殿,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,劳动创造了美,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。”

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,劳动者不但创造着物质财富,也创造着精神财富,按照美的尺度,创造着“美丽中国”。“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、也是历史的见证者,既是历史的‘剧中人’、也是历史的‘剧作者’”。我们向世界呈现当代中国,就必须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,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刻认识到:中国广大劳动者也是按照美的尺度在创造,他们在建设新时代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美的力量,是“中国力量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霍克海默、阿多诺在《启蒙辩证法》中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审美活动被异化的现实。审美活动被异化为追求利润的商品生产,作家艺术家成为文化工厂里的老板、包工头和工人,从而把审美贬低为娱乐,把艺术贬低为生意,造成了对人类本质力量的巨大伤害,对人审美能力的巨大伤害,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伤害。

对此,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:“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,不要沾满了铜臭气。”这是从

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,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,对艺术工作者提出的殷切期望。

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:我国是文学艺术大国,文艺创作队伍规模、作品数量、社会投入等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。读者、观众数量,在全世界更是首屈一指。但是,目前我们的文艺思想、艺术标准、审美能力、文艺理论话语能力和水平,同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的要求相比,还不太相称。

中华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,是伟大的历史进程。进入新时代,如何解决“大而不强”“富而不强”的问题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,我们必须坚决落实。

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文艺创作的“初心”

如果说在文艺艺术领域,我们还存在着“大而不强”的问题,那么,其中最突出的表现,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艺术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还不够清晰,对创作“初心”的认识,还不够深刻、不够到位。

习近平同志指出:“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,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,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、感情、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、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。”“我们生而为中国人,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”,它凝聚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创作的基础,就是我们文艺创作的“初心”。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”,而“基础不牢,地动山摇”。这样的初心,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“人的本质力量”。当代中国优秀的文艺作品,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人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。可以说,只有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磅礴力量的艺术作品,才称得上真正的当代杰作。

今天,我们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,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,就是要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,去感受这种本质力量,去坚定文艺工作者的初心。我们必须坚持真理,认识到当代中国文艺所肩负的神圣使命,从而在克服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中,在迎接各种风险与挑战的斗争中,不断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,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认识,为迎接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春天努力工作。

(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)

文坛经纬

企图通过书写家族史、个人史而让乡村复活,或者搭建起时下与过去的某种关联。李瑾绕离乡式、怀旧式写作而另辟蹊径,以“现实在场感”承担起一种历史使命,通过记录普通百姓的日常,让人在时间面前立起来。李瑾的这种努力,体现了乡土文学的一个努力方向,即作者在观察,在记录,但绝不是旁观者,也不是回乡者,而是在场者,都是历史的“剧中人”和“剧作者”。透过作品,我们可以看出,李瑾就是李村的村民,他在每一篇文章中的出现,都显示他是主角旁边的配角,配角背后的主角,你无法找出他和李村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的界限。和描写对象没有距离感,感觉不出丝毫违和,是《地衣》突出的艺术特色。“作家离地面越近,离泥土越近,他的创作越容易找到力量的源泉。”只有以在场者的身份,与生活保持同步性和同幅度,才能在精神和格局上实现“深刻提炼生活、生动表达生活、全景展现生活”。李瑾的新探索就是和电线杆、和五十二个普通百姓、和李村、和广袤的农村站在一起,是其中的一分子,一同保持着对生活、生命和时间、历史的敬畏。这样得出来的文章仿佛不是写的,而是生活的一种自然流露。

作品

我希望年轻人能够不断去探索和创新;希望他们在从艺路上不要总想着一帆风顺,遇到坎坷能够坚持下去,充满信心;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跟上时代、跟上群众的文化需求,给人以正能量,用作品去鼓舞、团结、教育人民

名师谈艺

回首57年的从艺生涯,我最深的感受是,作为一名歌唱演员,要坚持走探索、创新的路,为时代和群众唱出美好的歌曲。

我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后才广为人知的歌唱界“新人”。1979年,我演唱《乡恋》,这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具有时代性的作品。创作时,就是要让老百姓喜欢。实际上,这首歌曲原名叫《思乡曲》,第一稿风格独特、技巧要求比较高,适合专业人士演唱,但是不容易在老百姓中传唱。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,包括我、词作者、曲作者、录音师、音乐编辑等在内的创作组,在创作时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,我们认为这首歌在创作上也应该解放思想,不能再按照以前的音乐节奏、和声编配和旋律走向来写。于是,词曲作家重新创作,大胆突破,更符合时代要求,为老百姓喜闻乐见。修改后的第二稿也就是今天听到的《乡恋》,这个版本音域不高,但是很抒情,娓娓道来,如诉如泣。它还运用了探戈和打击乐乐桶鼓的节奏,这些在当时都是比较新鲜的。在演唱方法上,我也进行了探索和创新,选择了新的声音表达方式。《乡恋》问世后,受到广大群众的强烈认可和喜爱,它推开一扇门,吹来一股清新的风,被称为“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第一首流行歌曲”。

1984年,我演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这首歌在当时也是探索和创新的结晶。它是6/8拍节奏,引入国外的华尔兹,节奏欢快,在当时主旋律歌曲中是很少见的。这首歌的创作同样体现时代性:“我和我的祖国”,自己的国家在变得越来越好,人民充满喜悦,我对此也深有感受。所以,我在演唱时,很自然地将自己对祖国、时代和生活的感情填进歌中。当唱到“袅袅炊烟小小村落,路上一道辙”时,我会想到正在建设中的农村;当唱到“每当大海在微笑,我就是笑的漩涡”时,心中更是充满自豪。

伴随改革开放,出现一批有影响的电影。我为大约100部影视片配唱过200首歌曲,如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《绒花》《知音》《心中的玫瑰》等。因为我声音甜美,加上是戏曲演员出身,对剧情和人物性格把握得较准,所以演唱的这些歌曲都深受群众喜爱。为了将这些电影歌曲唱得更好,更深入地挖掘人物情感,我运用了“气声”技巧。“气声”不是唱法,只是技巧,它有全气和半气两种手法,强调的是此时此地“无声胜有声”的境界。

1986年,中国轻音乐团正式创建,我担任团长。之所以成立这个乐团,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想创立一个新的音乐艺术品种。这个艺术品种后来决定叫“轻音乐”。我之前所在的中央乐团以西洋音乐为主,创建中国轻音乐团,就是想在唱法、乐队演奏形式等方面有所变革。歌唱形式不拘泥一种,有流行、美声、民族等;在混合乐队中,除一部分弦乐、铜管、木管,电子琴、电钢琴、电吉他等电声乐器外,还有二胡、琵琶、古筝、京胡等民族乐器,这样它的演奏、伴奏更加丰富多彩,雅俗共赏。这在现在看来很普通,在当年是很有开创性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又提出“戏歌”的概念。我本身是戏曲演员出身,唱了大量“戏歌”,如《故乡是北京》《前门情思大碗茶》等,它们已成为我演唱歌曲中重要的一类。“戏歌”有两种表现形式,一是指原来戏曲中的经典唱段,如《刘涛砍樵》《浏阳河》,歌唱演员采用的是与戏曲不同的演唱和表现方法;二是指用中国戏曲元素创作出新的艺术品种,它们的风格非常独特,也是由歌唱演员来演唱。作为探索和创新,“戏歌”既丰富词曲创作者和歌唱演员的艺术创作形式,又对戏曲进行了发扬、保护和传承,同时因为很接地气,所以深受群众喜爱。

今天的年轻歌唱演员很认真、刻苦、努力。我希望年轻人能够不断地去探索和创新,为文艺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我也希望他们在从艺路上不要总想着一帆风顺,遇到坎坷能够坚持下去,充满信心,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跟上时代、跟上群众的文化需求,给人以正能量,用作品去鼓舞、团结、教育人民,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倡导的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,创作出符合新时代、服务于人民的优秀作品,无愧于“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”这一光荣使命。

57年从艺生涯,我不断进行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。我在艺术上所有的追求,取得的一点点成功,都来源于群众的滋养和支持,都来源于时代的呼唤和激励。我愿永远为时代和群众歌唱。

(本报记者周舒艺采访整理)

李谷一,194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,祖籍湖南长沙,民族声乐歌唱家、戏曲表演艺术家,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委员,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。音乐代表作有《乡恋》《绒花》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难忘今宵》等。曾多次获“最佳演唱奖”“云雀奖”“金唱片奖”“当代中国电影特别贡献奖”等奖项。

文艺评论